

图里翻译规范理论视域下《易经》的翻译对比研究

——以卫礼贤和闵福德为例

马艳华

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 浙江绍兴 312000

摘要:《易经》及其蕴含的思想精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易经》的翻译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具体呈现。作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渠道,《易经》传入西方已有四百年之久。西方译者基于国家的文化属性、个人理解等翻译了诸多不同语言、不同版本的《易经》,如卫礼贤、闵福德的英译本。不同版本的译作促进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同时也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单带翻译提供了优秀的案例支支持。基于此,文章将以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对比两者的翻译,期望为《易经》的翻译提供新视角,促进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关键词:《易经》; 卫礼贤; 闵福德; 翻译规范; 翻译对比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uli Translation Norm Theory—— Taking Wei Lixian and Min Fude for example

Yanhua Ma

Zhejiang Yuexiu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Abstract: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its ideological essence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is a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s a key channel to understand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Book of Changes has been introduced to the West for 400 years. Western translators have translated various version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into different languages based on national cultural attributes and personal understanding, such as the English version of Wei Lixian and Min Fude. The translation of different versions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and dissemin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also provided excellent case support for the single-tape translation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compare the two translations with Turi's theory of translation norms, hoping to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promote the transmission and inheritan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Keywords: The Book of Changes; Wei Lixian; Min Fude; translation specification; translation comparison

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 翻译典籍是了解彼此文化

的重要途径。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范,《易经》内蕴的天人合一思想在当下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如生态文明视域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同时,《易经》的翻译彰显了中华典籍的文化魅力,不仅促进中西文化的深度交

作者简介: 马艳华、1981年11月、女、汉、浙江绍兴人、本科、副教授; 研究方向: 中国文学英译, 英语教学法。

流,也有助于弘扬民族文化,更有利于增强文化自信与历史自信。从文化地位角度讲,《易经》与《圣经》可分别视为中西方文化的精神支柱,是中西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和情感的寄托。在儒家思想中,《易经》属“六经之首”;在道家思想中,《易经》是“三玄之冠”;在佛教思想中,《易经》是其文化源头。换言之,《易经》是我国古人智慧的结晶,其内容囊括人文、自然、社会等各领域。因此,在《易经》研究过程中,不同的学者能够从中得到不同的理解与启示,如哲学家从中体会的哲学道理,如科学家从中获得的宇宙奥秘,如文学家从中撷取的诗性语言,如史学家从中感受的历史画面。作为一种精神财富,这是西方学者翻译《易经》的重要原因。自《易经》传入西方,英译本的《易经》数量已超过一百种。其中,卫礼贤与闵福德的英译本最具典型与代表意义。究其根源,《易经》的抽象语言与深刻思想以及“微言大义”的中华文化属性是英译本数量众多的主要原因。因此,基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西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侧重点与翻译技巧^[1]。基于以上内容,本文以图里翻译规范理论为基础,以《易经》为文本依托,对比分析卫礼贤和闵福德的译本,寻找两个版本的不同翻译技巧和策略,为《易经》的当代传播与文化交流提供个人微不足道的力量。。

一、翻译规范理论的基本概述

图里翻译规范理论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基本的理论范式和翻译思路,该理论由著名翻译理论家图里构建而成,他以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为元点,以霍姆斯开创的翻译研究学派为线索,做了大量的翻译描述和理论建构工作,他继承和发展了霍姆斯的翻译思想并加入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想内容,最终促成了翻译规范理论体系的完成。

图里翻译规范理论是翻译界重要的理论内容之一,具有重要的操作性和实践意义,该理论内容丰富,理论性强,对于翻译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元规范与操作规范是图里翻译规范理论的两种类型,分别代表了宏观与微观层面的翻译指导,为不同翻译策略的构建提供了原理支撑。其中,指向宏观层面的元规范涉及两个因素,即翻译政策与翻译直接性;指向微观层面的操作规范则指译者的翻译技巧,这种翻译技巧能够呈现原文与译文的基本关系,直接或间接关乎译文传播,如添加、省略、分割、移动等都受到翻译技巧的约束。当然,作为一种翻译理论,图里还对翻译的环节进行了分析和构建,将分析分为初始、预备、操作三个步骤。其中,初始规范关系着译者翻译的基本标准,呈现了译者对于不同文化、不同语言要求的选择。预备规范则指对翻译政策与翻译直接性的因素考

虑。操作规范则能够影响译本的语言组织、整体结构等内容表达,影响着译本的传播^[1]。图里翻译规范理论构建以后,得到了众多翻译家的关注和研究,他们不断的补充和丰富该理论内容,构建起完善的翻译体系,为世界翻译事业的发展贡献出重要的能量。

二、卫礼贤与闵福德的《易经》译本比较

《易经》是我国古代智慧的结晶和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囊括了古代人文、社会、自然等众多内容,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更是我国民族精神和情感的集中体现和具体呈现,因此《易经》在国外同样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很多译者对其进行翻译,促进了该经典的国外传播与交流,其中卫礼贤与闵福德的《易经》译本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受文化背景和人文环境的不同,两位译者对该著作的翻译采用了不同的策略,呈现出不同的翻译效果。结合图里翻译规范理论内容,对两位译者的版本进行全面的梳理与探究,为当代翻译工作提供案例支撑和思路指引。

2.1 预备规范下的译本比较

2.1.1 卫礼贤译本的分析

首先,文化差异性。基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性,为提高译本的接受度,卫礼贤的译本将西方宗教因素与文学因素考虑在内。例如,卫礼贤多次将《圣经》与《易经》进行类比,以《圣经》的“佐证”促进西方读者深入理解《易经》的精神内核。比如在《周易》中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的卦象,卫礼贤将其翻译为:“Nine in the third place means: A prince offers it to the Son of Heaven. He is harmed by great possessions, because instead of sacrificing them, he would keep them for himself.”这里就渗透了西方《圣经》相关的内容,可以更好的帮助西方读者了解和熟悉文本的内容,加深对该内容的理解,充分体现了他对文化差异性的关注与思考,具有借鉴的意义。

其次,翻译风格。卫礼贤的译本能够在诸多译本中“脱颖而出”,主要得益于其鲜明的翻译风格,而这种风格的最大价值是能凸显原文的精神内核。例如,“初九:震来虩虩,后笑言哑哑,吉。”为再现该句的内涵,卫礼贤的译本为“Nine at the beginning means: Shock comes—oh, oh! Then follow laughing words—ha, ha! Good fortune.”可见,卫礼贤的翻译并未全面呈现其中的拟态词,而是用英语中的“oh”与“ha”取代“虩虩”“哑哑”。这种简单直接的英语拟态词能够使读者快速理解原文内涵,从而避免原文复杂拟态词的迷惑。

再次,内容删减。卫礼贤的译本剔除了原文中的占卜内容,跳出了因文化差异导致的理解程度。例如,“九三:

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亏悔，终吉。”为提高读者的理解程度，卫礼贤将其中涉及的文化因素剔除，有利于读者从自身文化语境出发理解原文内容。如“The handle of the ting is altered; Good fortune comes in the end.”在原文中，“鼎”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象征，承载着“祭祀”的独特文化内涵，并有“占卜”因素渗透其中。从受众角度讲，西方读者显然不能全面理解“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因此，卫礼贤用“handle”一词翻译“耳”。这就需要读者立足整本书的思想内涵去理解该词的哲学意义。

2.1.2 闵福德译本的分析

首先，再现本义。《易经》在译本中的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尽管古代译本与现代译本在字面上内容相同，但其内在的含义却发生了变化。闵福德的译本正是对这种含义变化的体现。在数字运用上，古代与现代的《易经》分别用阿拉伯数字与罗马数字。例如，闵福德用“HEXAGRAM 1”翻译“第一卦”。在书名翻译上，“Book of Wisdom”是现在《易经》的译名，目的在于推动读者的自我认知。与之对应，“Bronze Age Oracle”则是古代《易经》的译名，重点体现《易经》的占卜内容，闵福德的翻译正是指向《易经》本义的挖掘，再现本义的深刻内涵，为《易经》的传播提供了更多的动力。

其次，直译指导。较之卫礼贤的译本，闵福德在译本中借助拉丁短语作为解释。如“有孚挛如，无咎。”闵福德将其译为“Yang in Fifth Place Good Faith Binds. There is No Harm, Nullum malum.”再如，“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闵福德将其译为“Yang in Second Place, The Dragon Is seen in the fields, Draco in campis. It Profits To see a Great Man, Magnum virum.”由此可见，闵福德将拉丁短语渗透其中，旨在保存《易经》的神秘性，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东西方相似的认知观。更重要的是，《易经》中占卜的神秘性能够充分调动读者的阅读兴趣。

再次，重视注释。闵福德的译本加入了自己对《易经》的独特理解，并将其置于译文之下。这种注释性解释为读者预留了更多思考与对比空间，即在中外诸多学者不同解读的对比下加深对《易经》的理解。

2.2 初始规范下的译本比较

2.2.1 翻译政策因素下的比较

1924年，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出版了卫礼贤的译本。从时间背景与社会文化角度讲，此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重建秩序中。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为反思自身的文化取向，德国学者开始将目光聚焦于东方文化的探索

中。其中，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释道共同推崇的典籍《易经》吸引了他们的广泛关注。作为一名传教士，卫礼贤并没有对中国人进行神学方面的精神洗礼。作为一名出版商，迪德里希斯同样重视文化交流^[2]，而德里希斯出版社的知名度同样非常高。这促使他们计划共同出版一系列中华文学典籍。因此，此时的政策更注重思想自由，以此突破现代理性主义的束缚，反映了西方文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接纳。

2014年，维京出版社出版了闵福德的译本。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纵深发展，汉语在英语区的被接受程度越来越高。其中，对《易经》文化内涵的研究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从个人偏好角度看，曾在牛津大学就读的闵福德对中国哲学典籍产生了独特兴趣。他认为中西方哲学的关注点迥异，西方哲学往往更关注语言文字，而中国哲学则关注对人生的探索，这也反映了西方哲学与现实的脱离程度。维京出版社于1975年被企鹅出版社收购，基于作者资源的丰富性，企鹅出版社得以在美国迅速发展。

2.2.2 翻译直接性因素下的比较

在翻译过程中，直接翻译能够保证源语言文本的原始属性，这与间接翻译有很大不同。例如，卫礼贤的《易经》译本是德语版本，贝恩斯正是根据卫礼贤的译本进行英译，并于1950年出版。这种翻译版本并非从《易经》原文出发，因而属于间接翻译。值得注意的是，贝恩斯的英译本提高了西方人对《易经》的理解程度，同时也对卫礼贤译本的传播带来更大影响。闵福德的译本属于直接翻译是基于对语言本体的考察与探究基础之上，因而。究其原因，是因为闵福德将再现《易经》原著及其深邃内涵作为翻译的最终目标。如译本的第一部分，原文是《周易折中》，而这正是《易经》的总版本^[3]。

2.3 操作规范下的译本比较

2.3.1 母体规范的比较

在德国，卫礼贤翻译的《周易》具有很高的地位和一定的影响力，集中展现了他的翻译技巧和成果。另外，为了文本的需要，卫礼贤在翻译中将整本书划分为三部分，融合了《周易》与《易传》，让该经典更容易传播与接受，提高了该版本的知名度和学界地位。例如，第一部分为正文，包括64卦、自身理解与《象传》。其中，《象传》能够为普通读者的阅读提供便利。第二部分包括《说卦》与《系辞》等材料。其中，《说卦》是对六十四卦排列顺序及每一卦蕴含的意义的解释，而《系辞》则是从整体上概述《易传》。同时，卫礼贤将《说卦》中的十一章节重

新编排成三章,并根据章节内容与自身理解添加了副标题。第三部分为评注,是卫礼贤在每个卦尾的注解,是从《小象传》《彖传》《序卦传》《杂卦传》《文言传》等提取出来的信息。无论是哪一部分,卫礼贤都增加了很多“额外”内容,如个人理解与翻译注释^[4]。但是,较之第一部分对普通读者的照顾,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重点是为部分深入了解《易经》的读者而准备。与卫礼贤翻译的版本对比来看,闵福德更加重视对原著文本及其内涵的译介,注重对词源的考察与探究。在结构上,闵福德将其分为智慧之书与青铜时代的甲骨文两部分。其中,“智慧之书”旨在为读者提供生活上的启示与指导,因而以很长的篇幅阐释其中简短的占卜内容。尽管该部分的学术性并不高,但读者能够从中获得《易经》饱含的哲学意蕴。如每一卦都囊括《易传》内容、学者评论、译者解释等内容。“青铜时代的甲骨文”则重点翻译甲骨文,集中呈现了源文本的特点。

2.3.2 文本语言规范比较

首先,遣词造句比较。作为一种判断性词语,推辞是对一个卦或一条线的判断,并由此体现《易经》的占卜属性,具有普遍的应用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底蕴。例如,汉字“吉”的本义是吉祥和喜庆的意思,在本义基础上还有美好、漂亮、幸运、幸福等引申义。关于《易经》中“睽:小事吉”的翻译,卫礼贤译为“OPPOSITION.In small matters,good fortune”;而闵福德则译为“In small matters,This is Auspicious,Bonum”。其中,卫礼贤侧重从“吉”的引申义进行翻译,即“幸运”引申而来的“好运、运气”,这样的翻译集中体现了卫礼贤对《易经》的个性化理解。较之卫礼贤,闵福德则遵循了“吉”的“吉祥”本义,因而更是一种直译,这对美国读者了解《易经》的占卜属性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读者更好的接受文本的内容和思想,更好的理解丰富的文化内涵。再如,“咎”的直译是“过失”,然而卫礼贤将其译为“blame”,而闵福德则将其译为“harm”。在卫礼贤看来,“No blame”是指个体有能力通过正确手段纠正自身错误,侧重人的内省与宽容心,因而能够避免负能量的扩散。闵福德则以圣人“舜”的故事阐明“顺应道的消长”的重要性,即因“顺应”而不受伤害。所以,对比来看,两为译者都发挥了自己的长处和优势,让《易经》的翻译与传播具有更加多元的风格。

其次,句子结构比较。在翻译过程中,句子结构能够

反映译者的翻译水平与技巧。儒家之所以讲“六经之首”,是因为《易经》的完成时间最早。同时,《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春秋》均是文字形式,而《易经》则是绘画形式,因而在语言结构上非常独特。例如,“彖曰: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卫礼贤的译本为“THE JUDGMENT...It furthers one to see the great man.”而闵福德的译本则是“JUDGMENT Slight Fortune.A Destination Profits.It Profits To see a Great Man.”由此可见,两位译者在句子结构的处理上呈现较大差异。其中,卫礼贤更注重拟声词、押韵等手法,其翻译更像一个完整句式。从风格上看,这种风格符合读者的话语接收习惯。但是,这种基于读者考虑的翻译并未保留原文的诗意特征。与此对比,闵福德则从“忠实原文”的角度进行翻译,尤其保留了原文的停顿感,因而能够体现原文的诗意特征。换言之,闵福德的翻译风格是节奏感强、言简意赅、言辞全面,在整体句式结构上与原文有相似性。显然,这种翻译能够让读者感受东方文化的独特魅力,感受《易经》丰富多元的文化内蕴,为《易经》的海外传播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交流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三、结语

总之,以图里的翻译理论为基础和研究框架,将卫礼贤与闵福德的英译本《易经》进行对比分析,为已经的译介与传播提供了新的方向指引与思路借鉴。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语境之中,卫礼贤与闵福德的翻译结果呈现较大差异。通过预备、初始、操作规范比较,能够进一步证明《易经》等文化典籍的翻译趋向,即从整体意义的理解向体现源文本的精髓方向转变。当然,由于两位译者文化环境和人文经历的不同,在对《易经》的翻译策略上侧重点有所不同,对相同内容的处理方式也不同,但对于该经典的国外传播都起到了十分积极的影响,有助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传播与传承。

参考文献:

- [1]赵侠.图里翻译规范理论视角下的译者抉择[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1).
- [2]卢玉卿,张凤华.闵福德《易经》英译述评[J].中国翻译,2017(2).
- [3]李伟荣.汉学家闵福德与《易经》研究[J].中国文化研究,2016(2).
- [4]杨平.《易经》在西方的翻译与传播[J].外语教学与研究,2015,47(6):923-934,961.